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童庆炳 马新国 主编

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

童庆炳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

童庆炳 著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01·北京

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

童庆炳

马新国

主编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童庆炳 /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2001114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/童庆炳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1.12

(文化与诗学丛书)

ISBN 7-303-05775-7

I. 中… II. 童… III. 文学理论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5400 号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: 100875)

出版人: 常汝吉

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40mm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75 千字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 定价: 25.00 元

《文化与诗学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 童庆炳

副主编 马新国

编 委 童庆炳 程正民 马新国

李壮鹰 罗 钢 王一川

李春青 张海明

总 序

童庆炳 马新国

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、发展着。我们研究着的专业——文学理论——也是如此。回想 80 年代初期，文学理论界普遍对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这一“法规性”口号产生了反感，急于摆脱文艺的“他律”的束缚。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，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，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，“自律”的研究成为时尚。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“审美论转向”、“主体性转向”和“语言论转向”。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“转向”之时，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，则开始了另一种“转向”，那就是文学研究的“文化”视野的勃兴。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，有其自身的原因。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，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。如种族冲突、阶级冲突、性别冲突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、工业与自然的冲突等等，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。文学读者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、五十年代的“新批评”感到不满足，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“自律”，就艺术谈艺术，完全脱离社会与



总

序



现实，从他们囿于文学文本自身做法，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紧迫问题的发展。阅读文学的大众，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。文学大众对“新批评”感到厌烦，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。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“新批评”，重新重视文学的“他律”性，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，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“独立”，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。相反，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，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。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“气候”，各种“主义”应运而生。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，出现了“东方主义”批评，针对性别对立问题，出现了“女权主义”批评，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“后殖民主义”批评，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，出现了“新历史主义”……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，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“反诗意”的观点。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，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“审美”的狂欢“主体”狂欢和“语言”的狂欢，直到 20 世纪末，我们才发现我们又“落伍”了，要求走出“审美城”，呼吁建立中国的“文化研究”，“艺术文化学”或“文化诗学”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。

但是我们认为，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，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“落伍”的问题。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。近 20 年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，社会出现

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，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，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版的条条框框。这是一方面。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勿容讳言的。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。总起来看，主要的是“拜物主义”、“拜金主义”、“商业主义”等。“物”、“金”、“商业”都是好东西，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，但是一旦“唯”这些东西为圭臬，为上帝，为神明，那么物欲、金钱欲、情欲、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物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、压迫和消解，道德水准下降，腐败现象蔓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，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，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，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，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。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“内部研究”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，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，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，例如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、都市与乡村问题、东西部问题、廉政问题、古今问题、中西问题、性别问题、大众文化问题、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……不但如此，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，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，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，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 and 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，乃是根植于





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，并非从外国搬过来的。

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，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。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，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，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，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，过分政治化的话语，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“为政治服务”的痛苦记忆，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。但是，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，和关怀现实的品格，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，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，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？

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，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、神话、宗教、历史、科学关系的研究，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。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，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。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，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，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。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，对于“反诗意”的文化研究，我们认为不足取的。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。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，如“文革”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，在经历过“文革”的教训之后，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，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，还有其他成果，只要是好的，具有真理性的，不但要

继承下来，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。在审美、主体、语言和其他方面，仍然有发现的广阔的空间。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，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，怎么能把“诗意”“反”掉呢？我们仍然坚持，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，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，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。文学是诗情画意的，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。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、宗教、历史、科学、伦理、道德、政治、哲学等文化含蕴。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，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，不能分离的。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，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。这样，“文化诗学”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。

“文化诗学”仍然是“诗学”（广义的），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；但又是文化的，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，把所谓的“内部研究”于“外部研究”贯通起来，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，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。“文化诗学”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。

“文化诗学丛书”是北师大文艺学学术群落向文艺学前沿运动的又一次努力。这10本书内容不尽相同，有古有今有中有外，著作者的个性也较分明，看起来“面貌”并不相似。但我们的方法却都是“文化诗学”的。追溯文化背景，揭示文化意味，谈古必然要论今，谈西必然要论中，跨越中西古今文化距离，这是本丛书的一个基本





学术追求。

限于我们的学术功力，丛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漏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2000年5月23日

导言：古今对话

——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策略

在经过了几十多年的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之后，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终于觉悟到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我们在建设新形态的理论时，对其进行研究和借鉴是完全必要的。但是，完全地照抄照搬是不可取的。中国文论新形态的建设还必须以“我”为主，这样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就显得十分重要。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倾向：第一，只是把古代文论当作与现实的文论建设无关的对象，单纯解释字、词、句，只是作一些训诂的工作，结果是把古代文论仅仅当作一个死的东西来对待。当然，必要的训诂工作是研究的前提，但如果到此止步，那么我认为这种训诂工作的意义是很有限的，因为这还没有进入真正研究的层次。第二，把中国古代文论纳入西方文论的逻辑框架，名为“现代阐释”，实则消解了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民族文化个性，其弊病是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论证西方文论的资料，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文化特色完全消失了。我认为上述这两种倾向是研究方法上的失误，沿着这两条路走下去，是没有学术前途的。

我深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要采取古今对话的学术策略，这个策略包括以下三点：



一、历史优先原则

把中国古代文论资料放回到产生它的文化、历史的语境中去考量，力图揭示它原有的本真面目，其中包括作者论点的原意、与前代思想的承继关系、背景因素、现实针对性等。我这里只说“力图”，没有说“一定”，历史的本真面貌是不可完全复原的，但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。在对古代文论的文本的原意没有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，在对产生古代文论文本的时代文化背景没有真实了解的情况下，就开始古今对话是危险的。我们之所以要强调“历史优先原则”，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“还原”（实际上完全的还原一般是不可能的），激活古文论，使它在对话中能作为一个活的、有生命的主体出现。

二、对话原则

首先我们必须强调一点，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的东西，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辉煌的古代，热衷于把古董拿出来向世界炫耀一番，像阿 Q 那样说，“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”。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把古代学者们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，视为一份珍贵的遗产，并把这份遗产进行转化，使它能为我们今天所用。费尔巴哈在《基督教的本质》的序言中说：“虽然作者是以古代作为出发点来写作，但是，他的写作毕竟不是古代，而是在现代并且为了现代而写作的，从而在他研究鬼怪的原始本质时，就不会丢掉现代的鬼怪。”他的话说得很对。任何时代的学术研究，单纯的为古而古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古代的文论家在进行写作的时候，虽然也利用了前代人的材料，但他们理论的现实针对性是很强的，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大量运用从先秦以来的思想资源，但他全书却针对宋齐时代的浮文弱植、绮丽诡诞的文风，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与古人的对话，其中对儒、道两家思想的融合改造，对《周易》的转化运用，对佛学思想的渗透，更是十分突



出。由此可见，对话原则是学术研究的必然，不是谁提出来的。古今对话原则的基本精神是：把古人作为一个主体（古人已死，但我们要通过历史优先的研究，使其思想复活）并十分地尊重他们，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随意曲解他们；今人也作为一个对话的主体，以现代的学术视野与古人的文论思想进行交流、沟通、碰撞，既不是把今人的思想融会到古人的思想中去，也不是把古人穿上现代的服装，而是在这反复的交流、沟通、碰撞中，实现古今的融合，引发出新的思想与结论，使文艺理论新形态的建设能在古今交汇中逐步完成。我认为中西对话、古今对话是实现新形态的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基本途径。我不太同意用“转换”这个词，我喜欢用“转化”这个词。古文论不可能“转换”成现代文论，但古代文论可以融化、转化到现代形态的文论中来。就是说，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，不是单纯“发思古之幽情”，而是现实的文论建设之一个方面，因此揭示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是古今对话的根本目的。

三、自洽原则

这种古今对话怎样才是有效的呢？我认为这就要达到逻辑的自圆其说的标准。我这里说的逻辑，既指形式逻辑，更重要的是指辩证逻辑，辩证逻辑要求从历史的、发展的、全面的观点来研究问题，换言之，在对话中获得的思想应是符合历史进步的、具有发展观点的、全面的，而不是非历史的、反对发展的、片面的，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达到逻辑的自洽。对话不是各说各的话，对话要有必要的沟通、汇合、吸收、交锋、碰撞，要通过对话的确有所发现、有所创获。在对话中，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显露出来，现代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现出来，在这个基础上，经过长期的共同的努力，我们就有可能把现代文论的新形态推进一步。



童庆炳，1936年生，福建连城人。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留校任教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、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、美学、文艺心理学等方面研究。主编“心理美学丛书”14种、“文体学丛书”5种，“文艺学新视角丛书”5种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文学概论》上、下卷（1984）、《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》（1989）、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》（1990）、《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》（1992）、《文体与文体创作》（1993）、《文学审美特征论》（2000）、《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》（2001）、《童庆炳文学五说》（2001）等。另有多种合著及长篇小说、随笔出版。

ISBN 7-303-05775-7



9 787303 057757 >

ISBN 7-303-05775-7/I · 520 定价: 25.00 元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

文化与诗学丛书